曾巩散文的经典化及其多维阐释

黎清 刘双琴¹

【摘要】曾巩散文本于六经、言必及道，其经典属性在南宋理学语境下逐渐被认可，并经由“唐宋八大家”选本、在“唐宋八大家”概念框架内最终确认。在历代选家的选评与解读中，曾巩散文的经典性被定位为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念、穷尽事理的内容要素、严谨整饬的行文法度与雅正质朴的语言风格等多个层面的价值典范。曾巩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反映出理学思想对古文传统的涵容、实学思潮对古文接受的浸染以及科举制度对古文走向的影响，这正是曾巩在中国散文接受史上的典范性与独特性所在。

【关键词】曾巩 散文 经典属性 经典建构 阐释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 (2020) 11—0105—08

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人物。他“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1]。他生前被欧阳修器重，是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骨干；明代被茅坤等选入“唐宋八大家”，经典价值逐步确立；清代以来，深受康熙、乾隆二帝青睐，并对桐城派的散文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在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巩散文的文学经典属性如何被确立与解读，其文学经典名篇如何形成？本文试图从选本批评的角度探索这些问题。

一、曾巩散文经典属性的提出与确认

文学经典和经典化是一个重要议题。什么是“文学经典”？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篇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2] (P26)}所谓“经”，就是永恒不变又至高无上的道理，是不可磨灭的训导。“典”的甲骨文形象为双手捧着竹简，本义是指有垂范价值的重要文献书籍，许慎《说文解字》称：“典，五帝之书也。

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3] (P147)}概言之，所谓“文学经典”，就是承载文学之“至道”与“鸿教”的各类文学典籍与作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曾巩毕生以道德性命之学为重，他的散文继承、发扬“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反复驰骋，穷尽事理，文风古雅平正，“纤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4] (P10396)}，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他的文学作品具有无可非议的经典价值。

曾巩散文本于六经，言必及道，在他生前，已被很多人尊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典范。欧阳修称其文“引经据古，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5] (P339)}，王安石称曾巩“轡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6] (P755)}。据曾巩之弟曾肇撰《曾巩行状》称，曾巩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7] (P791)}，其言虽有溢美之嫌，然而，由此可以看出曾巩之文主要流播于学士大夫这一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精英阶层。

曾巩逝世后，其好友韩维撰《神道碑》，评价曾巩在文学上的地位说：“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7] (P804)}同年，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宋文人交游与文学关系研究”（14CZW023）

作者简介：黎清，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北京 100029）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西 南昌 330077）

刘双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西 南昌 330077）

希撰《墓志》称曾巩“公于经，微言奥旨，多所自得”^{[7] (P798)}。曾巩文章有古者“淳厚之遗”^[8]，“在孟学不传之后，程学未显之前”^{[9] (卷三六, P386)}，上接刘向、下启程朱，文道两栖，“可以算作道统中的枢纽人物”^[10]，因此，南宋以来，在理学思想影响日益扩大的语境中，曾巩散文的经典属性更为学者认可。

在曾巩散文走向经典化的进程中，朱熹是其中重要一人。南渡以后，文学以朱子为一大宗，朱熹独服膺曾巩。据朱熹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今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11] (P3965)} 朱熹喜好曾巩散文，是因为曾巩的散文“词严而理正”，“人之为言，必当如此”^{[11] (P3918)}。他甚至将曾巩散文的地位置于欧阳修之上，认为“公之文高矣，自孟、韩子以来，作者之盛，未有至于斯”^{[12] (P727)}。

文学作品的价值需要得到接受者的普遍认同，而接受者在文化场域中的地位往往会决定经典价值与权威性的高度。日本学者高津孝就指出：“曾巩散文的声价自北宋时期开始大增，但可以说，他被选入唐宋八大家，被权威化的直接契机还是南宋朱熹的高度评价。”^{[13] (P47)} 尽管在北宋时期，曾巩散文就得到欧阳修、梅尧臣、王安石、曾肇、陈师道等人的高度认可，但他们与曾巩或为亲友，或为师徒的复杂关系，使得在曾巩散文的评价上主观感受往往多于学理思辨。

而作为与曾巩关系不甚密切的理学宗师，朱熹在学理层面对曾巩散文经典属性的重要阐发，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理学家受众群体的产生，而且也对曾巩散文的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甚至直接认为曾巩“实开南宋理学一门”^{[14] (P606)}。随着南宋时期理学思想在文化精英阶层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另一著名理学家吕祖谦为示学者以门径，编撰《古文关键》，首次编选唐宋八大散文名家作品，并评价曾巩文“专学欧，比欧文露筋骨”^{[15] (P3)}，这为明清以来曾巩“唐宋八大家”经典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前期基础。

元明以后，理学逐渐由滥觞走向辉煌，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开始定型。在此文化语境下，曾巩散文的经典属性得到进一步阐释与确认。对曾巩散文儒家文化典范的肯定与认同，仍是精英文化阶层比较普遍的共识。元人虞集就称曾巩能“博考经传，知道修己”^{[16] (卷三三)}，“赫然为时儒宗”^{[16] (卷三五)}；明代孙慎行言“子固宿儒，故其气沉厚”^{[17] (卷首)}；艾南英也说“昔人所称读南丰曾氏之文，如见三代宿儒”^{[18] (卷三)}；清人李绂称“自汉以来，董、韩、欧、曾，皆粹然儒者”^{[19] (卷四五)}。

这一时期，曾巩文集及诗文刻本众多，刻书者身份主要包括南丰地方官员、外出为官的曾巩同乡以及曾氏宗族后裔，“三股力量共同推动，使曾巩成为翻刻次数最高的宋代文学家之一”^[20]。不过，真正将曾巩散文推向普通大众视野的还是各种选本的出现，特别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最终确立了曾巩散文的经典地位。该书主要为初学为文者指示门径，刊行以来，“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21] (P1320)}，“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22] (卷一八九, P78)}，曾巩的文名及其数量众多的散文也因此流播甚广并深入人心。

在茅坤看来，曾巩散文本于经术，折衷于大道，这正是对曾巩散文儒家文化典范的进一步认同。此后，各种“唐宋八大家”选本风靡云涌，曾巩散文被绝大多数选本收录，有些还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借助于科举考试这一国家制度安排，曾巩散文的儒家典范性价值得以广泛普及和推广，这极大地提升了曾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说，曾巩散文的经典属性最终在“唐宋八大家”这一概念框架内确定成形。

二、选本中的数量统计与曾巩散文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23]，文学经典的建构因素很多，除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及其可阐释的艺术空间外，特定时期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文学思潮和批评观念的流变等均是文学经典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外部要素。具体而言，各种外部因素主要包含如下三类主体：一是文学创作者，他们通过对作品的模仿与借鉴提高其知名度；二是作品编选者，他们通过编选选本扩大作品传播的广度；三是文学评论者，他们通过对作品的品评阐释挖掘其深度。

可以说，这三种力量共同推动着文学作品走向经典化。在中国文学史上，选本起着树立权威文学家、确定经典作品的作用，

是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甚至是必由之路。作为传统文学批评的形式之一，选本批评“具有多向度的批评功能”^[24]。每一种选本，不仅体现着编者个人的文学主张，还反映出一定时代的文学导向和文学思潮。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历代选本中出现次数越多，其被历代读者所接受的程度也越高。

如前所述，曾巩散文的经典属性最终在“唐宋八大家”的概念框架内确定成形，而“唐宋八大家”由最初的雏形到得以推广，正得益于吕祖谦、朱右、唐顺之、茅坤等一批文学作品编者。据统计，明清以来仅“唐宋八大家”散文合选本就有不下40种，这些选本还不包括多于八家、少于八家、溢出八家或专选八家中某一家的选本^[10]。因此可以说，曾巩在中国古文历史中的经典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历代选本确立并得以完成的。

下文笔者通过一些具体的统计数据，来展现曾巩散文在历代选本中的收录情况，并由此呈现曾巩散文在历代的经典化过程。笔者随机选取了36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选本，包括：宋代无名氏编《宋文选》、吕祖谦《古文关键》及《宋文鉴》、赵汝愚《宋名臣奏议》、魏齐贤等《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续文章正宗》、汤汉《妙绝古今》、王霆震《古文集成》，明代朱右《六先生文集》、王行《墓铭举例》、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吴讷《文章辨体》、唐顺之《文编》《稗编》与《六家文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徐师曾《文体明辨》、冯琦等《经济类编》、王志庆《古俚府》、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清代孙琮《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及《御定渊鉴类函》、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蔡世远《古文雅正》、乾隆《御选唐宋文醇》、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高塘《唐宋八家钞》、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汪森《粤西文载》以及雍正版《江西通志》。

就这36个选本中“唐宋八大家”作品收录情况来看：曾巩散文在宋元时期各选本中的入选频率为199篇次。若仅与“宋六家”比，则曾文入选频率排名第四，低于苏轼、欧阳修、王安石，仅高于苏辙、苏洵。在各选本中，曾巩散文入选量基本排在中后位，仅在《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居“宋六家”之首。到了明代，曾巩散文入选频率为360篇次，在“唐宋八大家”中排名第七，位次仅高于苏洵。较之宋元，明代选本所收曾文数量骤增。

其中，朱右《六先生文集》、唐顺之《六家文略》的出现，尤其是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横空出世，披沙拣金，在浩瀚的古代文学海洋中遴选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八家之文，并将之作为科举士子习文典范，这大大提升了曾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总的来看，明代诸选本所选“唐宋八大家”之文，曾巩散文数量仍居中后位，甚至是末位。朱右《六先生文集》所收曾巩散文数量虽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但这在当时非常少见。清代以后，曾巩散文入选频率为367篇次，在“唐宋八大家”中排名第五，低于韩愈、苏轼、欧阳修、柳宗元，仅高于王安石、苏辙、苏洵。这一时期，除“唐宋八大家”选本外，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御定的选本亦收曾巩之文，《御选古文渊鉴》所收曾巩散文甚至高达39篇，仅次于苏轼散文入选量，最高统治者的推行使得曾巩散文在清朝文化建设中普及程度进一步加强。

就以上36个选本的总体情况看，曾巩散文的入选频率为926篇次，在“唐宋八大家”中排名第六，位次仅高于苏辙、苏洵。这个排序结果与学者付琮研究得出的定型于茅坤、沿承至后代的八大家座次排名基本一致，也与宋、元、明、清各代曾巩散文入选量在八家中的排名基本一致。

以上是对各选本选录“唐宋八大家”散文的一个整体呈现。若就曾巩单篇作品在35个选本中的入选情况²来看，可以发现：

第一，曾巩散文共有315篇入选，入选数量占曾巩传世文章总量的近39.97%。其中，入选频次在5篇次以上的作品为54篇，占曾巩传世文章总量的6.85%。这一部分作品也是历代评论家品评、关注的重点对象，确定着曾巩“唐宋八大家”古文经典的地位。

第二，从文体上看，入选各选本的曾巩散文基本涵盖了传状、奏议、书说、杂记、碑志、诏令、序跋、论辩、哀祭、赠序等各种文体³。选录频次较高的散文中，杂记类最多，其次为序跋类，再次为赠序类，其后依次为：书说、论辩、传状、奏议、

碑铭、哀祭类。由此可见，在曾巩诸种文体中，序文与记文最为著名，也最受人们欢迎和关注。明代茅坤在《南丰文钞引》中就说“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25] (P3627)}，明末孙琮亦称“八家中，子固独长于学记……可废诸家学记”^{[25] (P3976-3977)}，清代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引方苞语称“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26] (P822)}，刘大櫟称“曾之所长者一，曰序”^{[27] (P194)}。所论甚是。

第三，在 35 种选本中，《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战国策目录序》二文入选次数最多，《列女传目录序》次之，《宜黄县学记》《徐孺子祠堂记》居第三。其后是《书魏郑公传》《新序目录序》《越州赵公救灾记》《移沧州过阙上殿劄子》《拟岘台记》《寄欧阳舍人书》《礼阁新仪目录序》《墨池记》《送江任序》《救灾议》等。这些文章可以说均为曾巩的名篇佳作，是曾巩散文中的经典之作、代表之作。

第四，入选以上 35 种选本的 315 篇曾巩散文，大致分为以下几种：（1）自宋元时期起就被许多选本关注和收录，明清时期仍然倍受青睐，如《战国策目录序》《抚州颜鲁公祠堂记》等。（2）宋元时期未引起选家注意，明清时期被选家发掘并反复收选，如《宜黄县学记》《越州赵公救灾记》等。（3）宋元至明代入选多个选本，入清以后逐渐销声匿迹甚至淡出选本视野，如《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仙都观三门记》等。（4）宋元至明清时期虽受到选家关注，但入选频次较低，或只出现于某一个时代的某一种选本中，这一类作品数量也比较多。一般来说，入选频次较高的作品，在不同时期的选本中出现频率一般都较高，反之则低。以上曾巩散文在各选本中的选录情况，不仅反映了曾巩散文受欢迎的程度，而且也反映出不同时代或选家的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

三、曾巩散文经典属性的多维阐释

曾巩散文在历代选本中如何被建构为文学经典？哪些因素影响到曾巩散文经典化的历程？这一经典化进程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文化内涵？一般来说，文学经典在得到确认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经典性”的定位问题。选本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以及士子科举考试的重要读本，面向并连接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阅读者。阅读者对曾巩散文作品经典属性的理解方式与解读效果，直接影响到曾巩散文经典价值的定位。通过对历代文献的解读可知，在以选本为载体的曾巩散文经典化历程中，接受者从儒家正统的道德观念、穷尽事理的内容要素、严谨整饬的行文法度与雅正质朴的语言风格等多个层面定义了曾巩散文中“道”“理”“法”“术”并重的经典性。

一是，曾巩散文经典性在儒家正统道德观念层面的确立。曾巩散文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理正词严，爱讲道理，发议论，这种文学思潮古已有之。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阐发了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曾巩生前，欧阳修就反复褒奖曾巩“文识可骇”^{[5] (P262)}，“好古，为文知道理”^{[5] (P212)}，他所强调的识见、道理，都是儒家正统道德观念。从曾巩散文在历代选本中的收录情况看，杂记、序跋、赠序三类文章最受青睐。

杂记大多由对事物的感知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生发，展示作者对道德、心性问题的认识，重在以记“载道”。序跋多由对传统经史典籍的介绍和评论着手，阐发作者对历史、儒学问题的见解，重在由序“明道”。赠序是古代传统的送别赠言文章，旨在诠释、传扬儒家正统道德观念，重在藉言“传道”。在选本中入选率高达 18 次的《抚州颜鲁公祠堂记》一文，宋人楼昉就评其“议论正”^{[28] (卷二七，P216)}，明代唐顺之评论此记曰“独言忤奸而不悔”^{[29] (P310)}，选家在阅读策略的选择上，都是从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维度确认曾巩散文的经典属性。

在以选本为载体、以选家为主体的文学批评中，曾巩入选率较高的名篇还有很大一部分被解读为正统儒家道德规范。如《战国策目录序》，茅坤认为“大旨与《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30] (卷一〇〇，P225)}，沈德潜称赞其“尊孔孟以折群言，所谓言不离乎道德者”^{[31] (P809)}。此外，储欣、张伯行、吴调侯、吴楚材等选评家对《列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礼阁新仪目录序》《赠黎安二生序》等文的评论，也反映出曾巩散文是如何在文道关系语境下、在与儒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彼此认同中走向经典化的。

曾巩散文能跻身“唐宋八大家”这一具有儒学学术意义的散文经典系统，这一过程还依赖于理学家的推动。理学家对曾巩的推崇不仅体现于对其散文的整体概观，也反映在对具体篇目的评价上。曾巩另有一篇入选率极高的散文《宜黄县学记》，这篇记文在南宋时期就很被朱熹看好。到了元代，理学家、抚州人吴澄把曾巩纳入从孔孟儒学到程朱理学的儒学学术体系发展脉络中，进一步阐释该文所传达的儒家正统道德观念，这在曾巩散文接受史上是一个重要信号。自此以后，随着“唐宋八大家”概念框架在选本中的确立，《宜黄县学记》的入选频次一跃而居于首位，热度已然超出《抚州颜鲁公祠堂记》《战国策目录序》等散文名篇。

二是，曾巩散文经典性在穷尽事理内容层面的确立。曾巩散文固守儒学之理，长于道古，古雅纯正，形成一种独特风格，刘熙载《艺概》将之概括为“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32] (P31)}。对曾巩散文“穷尽事理”内容要素的认识，可以追溯至欧阳修。欧阳修逝世前一年作《答曾舍人》，就称赞曾巩之文好处在于明白详尽、曲尽事理。明清以来，曾巩散文穷理格物的内容特质通过选本批评进一步被确立。清人张伯行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序称编选目的不仅是“资学者作文之用”，更是在于实现“穷理格物之功”。^{[29] (原序, P2)}

在此思想动机之下，张伯行选录曾巩之文 128 篇，远远高于其他诸家。格物致知，穷尽事理，这正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所倡导的认知世界的法则，即通过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在曾巩的文章里，儒学的道理往往被层层申发、阐述得淋漓尽致，此与理学家的阅读期待不约而同。由于曾巩文学创作与朱熹等理学家学术思想上的相通性，当后世论者谈及曾巩，曾巩理学家形象不断凸显，其散文格物致知的理学特质也不断被强化。明代邵廉《序刻南丰先生文集》评《筠州学记》，就有“详次《大学》诚正修身，而本之致知”^{[33] (P2084)}之语。曾巩的其他散文名篇如《书魏郑公传后》《南齐书目录序》，也是在穷尽事理的层面被楼昉、茅坤、张伯行等反复阐释。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以“格物致知”评曾巩之文还应关注一个现象，就是肇始于宋代、鼎盛于明清的实学思想传统。可以说，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中介和桥梁，实学始终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强调崇实黜虚，主张学术要有益于治国理政，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已经符合了经世实学的某些思想趣味，到清代前期，乾隆组织编撰《御选唐宋文醇》，更明确要求辞达理诣、足为世用。

“格物致知”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体系，在以乾隆为代表的明清文选家中，它是包含了知性智慧、心得感悟与知识道理等众多内容要素的经世哲学。实学思想对曾巩散文接受的影响体现在其多篇散文的经典化历程中，典型者如《越州赵公救灾记》。该文在两宋时期并未受到特别关注，明清以来，茅坤从探究事理以为世用的社会功用目的来发掘其经典价值，称此文记其事理发栉，“救灾者熟读此文，则于地方之流亡，如掌股间矣”^{[30] (卷一〇四, P279)}，由此引发明清以后众多选本对此文的关注。入清之后，乾隆更是将该文视为“司牧之臣案间必备之书”^{[34] (卷五六, P942)}，可见曾巩散文在明清选本中从经术文章向世务文章转变的经典化走向。

三是，曾巩散文经典性在严谨整饬的行文法度与雅正质朴的语言风格层面的确立。“为文章写作提供方法上的借鉴，是经典散文的基本功用之一”^[35]。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及选本的大量出现，从经典散文中探索文章写作法则与规律逐渐成为新的文学需求与学术焦点。在此学术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阅读者开始尝试从文章技法视角对曾巩散文进行解读，选家编选本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适应这一需求，为士子们提供写作范式上的借鉴。

曾巩散文有哪些更为具体的、值得借鉴的地方？选本批评者对此作了非常多的概括，解读的切入点既包括宏观的创作法则、谋篇布局，也包括具体的段落安排、字词运用。宏观层面解读者如南宋吕祖谦、明代唐顺之，在他们的阐释中，篇章结构的巧妙布置使得曾巩散文具有明显的可法性。曾巩其他几篇入选率较高的散文，如《筠州学记》《墨池记》《宜黄县学记》，也因结构布局之善赢得选家的称许。此外，评论家进一步予以文本细读，试图从曾文中总结出独特且可资借鉴的创作方法，如康熙评论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就提炼出“转折脱卸之法”^{[36] (第三集卷四一, P314)}。

曾巩为文重在明道，与欧阳修、苏轼等形成不一样的创作面貌和语言风格，选本批评家将其归纳为“质”。文与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对重要又常见的概念，“文”表示“纹理”，进而引申出“文章”“文采”等意义，“质”的本义是指事物未经雕饰的状态。文质理论构成古代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批评者对文学的判断。以“质”这一术语来审视曾巩散文，这在历代批评家笔下屡见不鲜。曾巩好友韩维所撰《神道碑》就称“猗嗟子固，文与质生”^{[7] (P804)}，南宋朱熹也认为曾巩之文“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37] (P4308)}，清代张伯行也反复评曾巩之文“质实深厚”“质劲”“简质”^{[29] (P234、P236、P357)}。

曾巩散文在被具体解读的过程中，由知识精英塑造为作文技法层面的典范，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科举需求的回应。不过，曾文质实，也颇蹇涩，不宜发人才思，此为科举文之一忌，所以，在以科举认同为核心关切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中，与其他几大家相比，曾巩声名并不特别显著，被视为经典并反复选录的曾巩散文名篇中，科举考试所要求的策论文也无突出表现。可见，知识精英标榜曾巩散文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使士人功利性地获取科考应试的具体方法，而是力图通过推广曾巩散文以引领文坛风气与调和文道关系。

总之，曾巩散文的经典价值在南宋理学语境下逐渐被认可，并经由“唐宋八大家”选本最终确认。正如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序》所称：“大家之文，其气昌明而俊伟，其意精深而条达，其法严谨而变化无方，其词简质而皆有原本，若引星辰而上也，若决江河而下也，高可以佐佑六经，而显足以周当世之务”^{[29] (原序, P1)}。曾巩散文经典属性自宋代起在儒家道德观念层面被认同，随着明清实学走向高潮，其典范价值进一步在穷尽事理层面被广为推崇，科举制度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曾巩散文经典价值在行文法度与语言风格层面的确立。曾巩散文经典化历程及其价值属性的确认，反映出理学思想对中国古文传统的涵容、实学思潮对古文接受的浸染以及科举制度对古文走向的影响，这也正是曾巩在中国散文接受史上的典范性与独特性所在。

参考文献:

- [1] 王水照. 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J]. 复旦学报, 1984, (4).
- [2]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东汉) 许慎. 说文解字[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 [4] (元)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5]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 33 册[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 [6] (宋) 王安石. 临川先生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7] (宋) 曾巩. 曾巩集[M]. 陈杏珍, 晁继周,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8] (明) 蔡方炳. 南丰文选序[A]. 蔡方炳. 蔡息关先生八大家集选[M]. 康熙二十年吴郡宝翰楼刻本.
- [9] (元) 吴澄. 吴文正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97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0] 付琼. 唐宋八大家座次考论[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 (6).
- [11] (宋) 朱熹. 朱子全书: 第 24 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 [12] (宋) 朱熹. 朱子全书 (修订本): 第 26 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 [13] (日) 高津孝. 科举与诗艺: 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M]. 潘世圣,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14] 王英志. 袁枚全集新编: 第 7 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 [15] (宋) 吕祖谦. 古文关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6] (元) 虞集. 道园学古录[M]. 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 [17] (明) 孙慎行. 唐宋八大家文抄[M]. 崇祯二年刻本.
- [18] (明) 艾南英. 天慵子集[M]. 清光绪重刊本.
- [19] (清) 李绂. 穆堂初稿[M]. 清道光十一年奉国堂刻本.
- [20] 何明星. 曾巩诗文 900 年间的传播历程[J]. 出版人: 图书馆与阅读, 2010, (5).
- [21] (清) 张廷玉. 二十四史 (附清史稿): 第 10 卷[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22] (清) 纪昀.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5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3] 童庆炳.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3).
- [24] 党圣元. 论选本文体批评功能[J]. 甘肃社会科学, 2019, (3).
- [25] 高海夫.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 南丰文钞老泉文钞[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 [26] (清) 高步瀛. 唐宋文举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7] 吴小林. 唐宋八大家汇评[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1.
- [28] (宋) 楼昉. 崇古文诀[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35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29] (清) 张伯行. 唐宋八大家文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0] (明) 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384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31] (清) 沈德潜. 唐宋八大家文读本[M]. 于石, 校注.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32] (清) 刘熙载. 艺概[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33] 余冠英, 周振甫, 启功. 唐宋八大家全集[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34] (清) 乾隆. 御选唐宋文醇[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447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5] 裴云龙. 苏轼散文的经典化历程及其文化内涵——以 1127—1279 年为中心[J]. 文学评论, 2015, (2).

[36] (清) 康熙.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299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37] (宋) 朱熹. 朱子全书: 第 18 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注释:

1 “八家”专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8 人。

2 由于朱右《六先生文集》已失传, 故考察曾巩单篇作品的入选情况时, 此选本不计入统计。

3 对曾巩古文文体的分类与界定, 参照姚鼐《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